

“空间生产”是一个涉及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概念。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生产”学说,认为空间不仅是物理环境,更是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动态场域。考古遗址、历史街区、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往往分布在特定物理空间范围,同时又承载着精神性、社会性等多元空间诉求,“空间生产”理论为我们理解遗产的空间社会建构本质及其人地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工具包。

试以“空间生产”理论分析考古遗址公园。作为边界清晰的限定空间,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包含遗址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等物质载体,还包含物质空间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精神感知与社会生活。考古遗址公园的建造过程就是对该空间的再生产与重塑,不仅生产物质性的景观,还生产空间的价值内涵与感知体验,分别对应“空间三元辩证法”中物质载体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的文化再造,以及“表征空间”的精神感知。

丝路遗产的价值

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Silk Roads: the Routes Network of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跨度近5000千米,由33个遗产点组成,其中,22个位于中国,8个位于哈萨克斯坦,3个位于吉尔吉斯斯坦。2023年,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泽拉夫善—喀喇昆仑廊道”(Silk Roads:Zarafshan—Karakum Corridor)跨度866千米,由34个遗产点组成,其中9个位于塔吉克斯坦,16个位于乌兹别克斯坦,9个位于土库曼斯坦。此外,“丝绸之路: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Silk Roads:Fergana—Syrdarya Corridor)、“丝绸之路:伏尔加—里海走廊”(Silk Roads:Volga-Caspian Corridor)等也正在积极申报世界遗产。

业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两组丝路遗产共包含67处遗产点,涉及城镇遗迹、商贸聚落遗迹、交通及防御遗迹、宗教遗迹、关联遗迹等不同类型。丝路遗产作为文明交往路网的代表性物证,见证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欧亚大陆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交流和互通,体现了中国与中亚各种文明与文化之间,跨越山川湖泊、戈壁沙漠、山谷草原等地理屏障的交流对话,其突出普遍价值不仅在于各个遗产点的物质遗存,更在于民族交往、商品贸易、文化传播等多维度的深度互动与交流互鉴。

丝路遗产的分类

“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动态产物,是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我们可以按照历史功能、环境变迁、当代功能等不同维度,对丝路遗产的空间属性进行初步分类。

历史功能维度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交往的贸易通道,更是文化交流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网络。作为一个长时期、长距离的跨文明交流网络,其遗产构成本质是复杂贸易路线网络及其多功能空间系统,可依据其历史功能划分为交通运输、居住生活、墓葬体系、文化交流、防御体系、商业贸易等类型。以下结合具体遗产点择要举例说明:

交通运输遗产,主要包括古道、关隘、驿站、烽燧等设施。如峭峪古道石壕段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硤石乡石壕村西南约2千米处,现存长约230米石灰岩质地路面,保存有古代车辙、蹄印、蓄水池等遗迹。该古道是汉唐时期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交通要道的组成部分,是丝绸之路长期、长距离交通系统的珍贵物证。

居住生活遗产,主要包括都城、城镇等定居点遗迹。如北庭故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整体呈长方形,分内外两重城,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为公元7—14世纪丝绸之路东天山北麓的重要军政中心和交通枢纽。

墓葬体系遗产,以丝绸之路沿线相关的墓葬群为代表。如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的果园—新城墓群,保存有三国时期至唐代(公元220—907)墓葬1400余座,包括贵族墓、官吏墓、平民墓等,是丝绸之路沿线面积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一处古墓葬。

文化交流遗产,以宗教场所如石窟、寺庙等为代表。位于塔吉克斯坦瓦赫什盆地腹地的阿吉纳·特佩(Ajina Tepe)佛教寺院遗址,建于公元7—8世纪,体现了犍陀罗、笈多、贵霜和粟特等多种文明文化融合的特点。

除此之外,丝路遗产还包括防御体系遗产、商业贸易遗产等其他类型,为我们揭示出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中的多重功能与意义。

环境变迁维度

丝绸之路文明交流通道的形成,与特定的自然地域环境系统密切相关。从古今环境变迁这一维度分析,丝路遗产又可划分为“地域环境巨变”和“地域环境微变”两大类。其中,地域

环境巨变遗产可分为两种类型:(1)人居—旷野;(2)旷野—人居。地域环境微变遗产可分为五种类型:(1)城市—城市;(2)城市—乡村;(3)乡村—城市;(4)乡村—乡村;(5)旷野—旷野。以下结合具体遗产点择要举例说明:

人居—旷野型遗产

库什梅汗古城(Kushmeihan, or Dinli Kish-man)位于距梅尔夫以北约30公里的卡拉库姆沙漠边缘,由一座早期堡垒和一座中世纪城址组成。城市逐渐废弃后,该区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演变为旷野地域环境。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多数古城遗址属于该类型。

旷野—人居型遗产。汉长安城厨城门一号桥位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北侧渭河故道,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秦汉木梁柱桥,被称作“丝绸之路第一桥”,这一丝路遗产为明确汉长安城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河流改道,曾经位于城外旷野的河道已被现代村庄叠压,区域环境发生巨变。

城市—城市型遗产。隋唐洛阳城定鼎门是隋唐洛阳城的正南门,在门址南侧发现有唐代路面,存有人物的脚印、动物蹄印和车辙等遗迹。现代洛阳城是在隋唐洛阳城的空间之上发展而来的,定鼎门遗址的周边环境依然为城市。

城市—乡村型遗产。拉甫却克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在唐代是一座格局清晰的城市,为唐代丝绸之路沿线次级聚落和交通节点,属于城市地域环境。经过历史变迁,拉甫却克古城虽已变成遗址,但其周边一直有居民居住,并在当代形成了自然村落博斯坦村,其地域环境转变为乡村。

旷野—旷野型遗产。玉门关遗址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90公里的小方盘城,是汉代长城的重要关口和边防要塞,在当时即属于旷野区域的交通节点。当代玉门关遗址周边环境仍为空旷的戈壁荒原,距离最近的城镇仍有一定距离,其区域环境未发生较大改变,仍属于旷野型遗产点。

当代功能维度

因古今环境变迁、政治社会变动等因素,丝路遗产的当代功能与历史功能既可能重合、实现延续,也可能中断、增减或创新。基于遗产功能的变化可分为两大类:“功能延续型”和“功能嬗变型”。其中“功能嬗变型”又可细分为“功能增益”和“功能衰减/中断”两种类型。以下结合具体遗产点举例说明:

功能延续型遗产。希瓦古城(khiva)位于阿姆河下游绿洲地带,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目前仍有大量居民生活其中,生活区重叠于遗产区之上,古城的当代功能与历史功能基本重合。

功能嬗变型遗产。唐大明宫遗址的历史功能是唐代统治者处理朝政、生活起居的宫殿,后因朝代更替、宫殿毁弃沦为城郊农田,历史功能发生改变,又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而融入当代城市社会发展,形成了不同于历史功能的当代功能。

功能增益。河南洛阳白马寺除了延续历史时期的宗教功能以外,增加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化旅游等当代功能,属于功能嬗变遗产中的功能增益遗产。

功能衰减/中断。楼兰故城遗址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古城遗址,历史上是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的居住聚落和交通节点,在城址废弃后历史功能中断,当代功能不突出,属于功能嬗变遗产中的功能衰减/中断遗产。

几点思考

“空间生产”不仅是地理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建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空间的价值赋予与意义重塑。文化遗产所存有的物质载体空间,其“生产”过程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等多种外部力量的影响,不同利益群体基于自身需求与利益诉求,通过权力博弈、动态、持续地参与遗产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空间所具有的“物质性—精神性—社会性”三元一特点,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特征—主观意义—社会效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物质空间作为社会活动场所,承载着空间精神文化与社会交往,精神空间源自社会群体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影响着物质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空间的互动模式同样会反作用于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以上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他两个部分的变迁。由此推之,丝路遗产的历史文化记忆和遗产区居民的现代创造实践,是将精神空间的价值认同与社会空间的生活实践共同叠加于丝路遗产物理空间之上,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层积复合情境”。通过对“文化层积复合情境”的综合保护与价值挖掘,可以推动物质遗存的保护传承,促进精神意义与社会效用的再生与再创造,以更好维系丝路遗产空间的“文化连续性”。

丝路遗产的内在价值与衍生价值均依赖于其“空间资源”,从“空间资源”视角出发,基于物质、精神、社会空间的不同特点及互动关系对遗产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再创造,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其内/外部价值予以转化创新,以探索丝路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从遗址到博物馆

——西夏陵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位于三号陵口的临时活动帐篷

初创西夏文物陈列室

1986年7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委托银川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了开发西夏陵旅游区的问题。10月19日,西夏陵旅游区正式对外开放,当时陵区利用临时活动帐篷接待游客。

参观游客络绎不绝,为了适应开放形势,加强西夏陵旅游区的保护管理工作,1986年11月12日,银川市西夏陵旅游区管理所获批成立。

1988年1月13日,西夏陵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1日又被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西夏陵积极改变简陋环境,提升硬件设施以更好地接待参观人员。1988年3月至9月,在3号陵东南侧500米处建成北厢房,北厢房为仿古建筑,共15间。北厢房建成后,管理所制作完成大型壁画“西夏魂”和图文并茂的“西夏陵出土文物图片展”,这是西夏文物陈列室的雏形。1990年6月,建造落成221.59平方米的仿宋式建筑大殿(7间)。

1997年7月,建成15间砖木结构仿古建筑南厢房,面积498平方米。南厢房建成后,文物陈列展出场地得以拓宽,管理利用旧展板自己设计安装,完成西夏历史文物展、大型壁画展、西夏出土文物展、复原模型展和西夏陵全景鸟瞰图,作为西夏文物陈列室展示宣传西夏历史文物,使前来参观的游客对西夏历史有了初步了解,反响良好。

1998年9月23日,西夏博物馆落成开馆,取代南厢房,正式发挥文物展陈和办公等作用。南厢房及其所在的西夏陵旅游区管理所院子,后被改建成西夏史话艺术馆。

新建西夏博物馆

1997年1月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同意成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和银川市西夏陵风

景名胜区管理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直属市政府领导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全面负责西夏陵的管护和建设。这一重大举措健全了管理机构,理顺了管理体制,对西夏陵区今后的保护管理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收集、保存西夏珍贵文物,展示西夏历史文化和文物资料,1997年4月15日西夏博物馆项目获批立项。西夏博物馆坐落在西夏陵区3号陵园东南侧,1997年8月8日动工新建,1998年6月开始布展,1998年8月底竣工,9月23日正式开馆。博物馆占地面积5300平方米,立体建筑长65米,宽37米,高20米,建筑面积395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陈列面积1883平方米。特邀书法家钱君匋先生题写了“西夏博物馆”五字馆名,馆内设有序厅、西夏疆域模型厅、西夏历史厅、西夏社会经济厅、西夏文化厅、西夏学术研究成果厅等各类展厅9个,精选最具代表性的西夏文物671件,西夏研究成果413册(篇),辅助展品173件,展品共计1257件(册),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西夏王朝的兴衰历史。

因新馆改建,西夏博物馆自2018年12月24日起闭馆。1998年建成的这座西夏博物馆,经实施外立面改造工程后保留。这座满怀热情展示西夏珍贵文物、敞开胸怀接待四方游客、承载一代西夏陵工作者青春和回忆的博物馆,成为昔日西夏博物馆建设工作的重要见证。

迁建西夏博物馆新馆、更名西夏陵博物馆

2011年11月23日,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启动了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工作。根据申遗规划要求,2016年银川市政府投资建设西夏博物馆新馆,历时三年,于2019年2月完成陈列布



韩阳

“保得好”跃升,让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持久生命力。

尊重历史空间格局,完整延续城市文脉的结构原真性

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体现在单体建筑的形制、材料与工艺上,更深刻蕴含于建筑群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整体格局之中,是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无需超越“重单体、轻环境”的传统思维,将保护视野拓展至街区乃至城市层面,注重维系建筑与街巷、院落与城廓之间的有机联系。许多古城虽历经变迁,部分房屋或经倒塌重建,但其主体建筑间的空间方位与街巷脉络得以延续,如福州“三坊七巷”、开封“七角八巷”,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街角巷陌,承载着城市千百年演进的空间记忆,与重点文保单位共同构成完整、可谈、有温度的历史风貌整体。一旦这种空间肌理遭到割裂或破坏,历史建筑便从有机网络中被剥离,沦为孤立的“文化盆景”,连贯的空间叙事与文化语境便随之断裂。此外,部分历史建筑因长期被单位或居民分据占用,原有格局支离破碎,进一步加剧了空间失序。因此,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性、原真性保护,统筹推进腾退搬迁、违法建设整改与环境整治。通过还原历史空间格局,妥善处理古与今的时空对话、点与面的结构关系,推进从“碎片保护”向“整体传承”转变,让古城肌理在新时代城市发展中被剥现金。

赓续在地文化基因,涵养弘扬历史空间场域的精神原真性

原真性不仅是一种城市物理空间的属性,更体现在城市内部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之中,是日常体验逐步累积而成的独特价值。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越来越多城市将原真性作为文化品牌塑造的核心维度,一批依托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新型文化空间脱颖而出,构筑了近悦远来的文脉地标。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人与历史文化建筑活态共生,使建筑文化遗产不仅是网红打卡的背景板,而是深度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日用而不觉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更好地传承与保护。保持原真性应让历史建筑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滋养在地文化的延续与新生,真正实现



西夏陵博物馆新馆

展,6月12日举办了开馆仪式,6月13日正式对游客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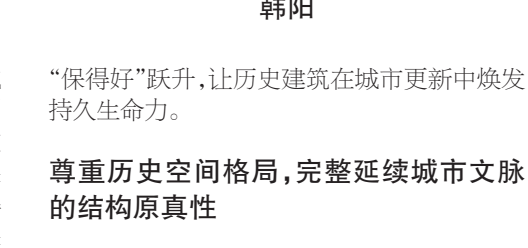
新馆坐落在西夏陵遗产区东侧,总建筑面积9000平方米。基本陈列有西夏史、西夏文化、西夏宗教艺术、西夏社会经济、西夏陵、保护与传承等6个常设展厅。展出珍贵西夏文物2000余件,西夏学术研究成果2000余册。其展陈在2019年喜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2024年3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银川召开西夏陵申遗工作会议,对外发布西夏陵申遗工作正式启动,西夏陵进入申遗冲刺阶段。为更贴合展示西夏陵遗址,西夏陵对博物馆展陈进行升级改造,一方面,对一楼四间展厅的展板文字、图表进行排查,对不符合文本要求的内容进行更改调整;对二楼西夏陵、保护与传承两间展厅则进行重点改造提升,打造成“西夏陵中华文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的见证”——西夏陵文化遗产价值专题展,以系统阐释传递西夏陵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在2024年4月26日,正式将西夏博物馆更名为西夏陵博物馆,以突出其展陈主题。2024年5月,西夏陵博物馆被公布为第五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价值展于2024年12月入选2025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推介展览;于2025年5月荣获第二十二届(202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特别奖。

新馆自开馆以来,积极发挥博物馆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的重要作用,尤其积极开展闽宁文化合作,先后与福建民俗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漳州博物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福州鼓楼区博物馆联合办展,构建了闽宁交流新桥梁。

(作者单位:西夏陵综合管理中心)

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韩阳

“保得好”跃升,让历史建筑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持久生命力。

尊重历史空间格局,完整延续城市文脉的结构原真性

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体现在单体建筑的形制、材料与工艺上,更深刻蕴含于建筑群落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整体格局之中,是城市历史肌理与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无需超越“重单体、轻环境”的传统思维,将保护视野拓展至街区乃至城市层面,注重维系建筑与街巷、院落与城廓之间的有机联系。许多古城虽历经变迁,部分房屋或经倒塌重建,但其主体建筑间的空间方位与街巷脉络得以延续,如福州“三坊七巷”、开封“七角八巷”,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街角巷陌,承载着城市千百年演进的空间记忆,与重点文保单位共同构成完整、可谈、有温度的历史风貌整体。一旦这种空间肌理遭到割裂或破坏,历史建筑便从有机网络中被剥离,沦为孤立的“文化盆景”,连贯的空间叙事与文化语境便随之断裂。此外,部分历史建筑因长期被单位或居民分据占用,原有格局支离破碎,进一步加剧了空间失序。因此,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体性、原真性保护,统筹推进腾退搬迁、违法建设整改与环境整治。通过还原历史空间格局,妥善处理古与今的时空对话、点与面的结构关系,推进从“碎片保护”向“整体传承”转变,让古城肌理在新时代城市发展中被剥现金。

赓续在地文化基因,涵养弘扬历史空间场域的精神原真性

原真性不仅是一种城市物理空间的属性,更体现在城市内部复杂而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之中,是日常体验逐步累积而成的独特价值。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越来越多城市将原真性作为文化品牌塑造的核心维度,一批依托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新型文化空间脱颖而出,构筑了近悦远来的文脉地标。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应更加关注如何促进人与历史文化建筑活态共生,使建筑文化遗产不仅是网红打卡的背景板,而是深度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日用而不觉的一部分,从而实现更好地传承与保护。保持原真性应让历史建筑更好地适应现代生活,滋养在地文化的延续与新生,真正实现

在动态发展中守护城市的历史根脉与人文魅力。

激活遗产社会功能,推进原真性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不仅是城市历史的实物见证,更是涵养城市文化、延续文脉基因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多地探索将原真性要素有机融入现代城市空间,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天津在地铁4号线东南角站建设中,原址原位保留了一段长21米、高2.1米的明清天津卫故城东城墙遗址,使其成为地下空间中可触可感的“城市原点”,为市民提供了与历史对话的独特场域,充分彰显了文化遗产在现代基础设施中的文明价值。同时,建筑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还体现为其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符号——中原之雄浑、江南之秀逸、西北之质朴、岭南之灵巧,皆以独特的建筑语言传递着地方文化的深层内涵。对这些原真性符号的提炼转译,不仅能够增强建筑的文化识别度,更可赋予现代空间以历史温度与美学厚度。如河南大学雁鸣湖校区在规划建设中,汲取明伦校区传统建筑的形制、色彩与空间韵律,延续其原真性建筑语言,既实现了校园文脉的传承,也拓展了文化遗产的当代影响力。面向高质量城市更新,应在重要公共建筑设计中有机关入本地标志性历史建筑的原真性元素,规避“千城一面”的同质化倾向,以文化标识的现代表达增强城市视觉辨识度,塑造具有中华美学和时代风格的城市特色风貌,为实现城市内涵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中国,传统建筑更有承载着独特的“纪念碑性”——通过其形制格局、空间序列以及与之相生的礼仪实践,被赋予庄重的集体记忆、文化信仰与制度象征,成为民族精神与历史连续性的空间载体。对建筑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守护,本质上是对这种文化“纪念碑”的维系与再生产,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承诺。我们应当“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在更新中秉持审慎态度;更应的应是老化失能的构件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引入的应是安全可靠的现代技术与使用功能,但不变的是建筑的历史风貌、空间气质与文化基因。通过实现“以新护旧、以今承古”的辩证统一,让历史建筑在延续古物之精神的同时,焕发时代之生机,真正成为可阅读、可感知、可传承的城市文明地标。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